

知善和行善不是一码事儿

这些年关涉道德的具体影像,总是会激荡出高远的声响,一些高尚的道义人士甚而还会亲自动手画一条线,并以“道德底线”来强调其所画之线的重大意义,诸如此类。

作为市井之徒,俺眼界比较低俗,当然,也有自我拔高的时候,可就算如此,“道德”这种复杂高深的学问,还是不敢自认为清楚明了。

比如说吧,无脑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虽然电影看了很多遍,末了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叫朱尔斯的黑道小混混为什么会决定放弃娴熟的职业生涯,这还不够,这货居然还准备苦行僧般去追求真理……

这变化太大了,很烧脑。照镜子看看,简单如“纯粹的人”到底所指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复杂如斯的思想怎么能够明白啊!可能是路口走岔了,想了不该想的事儿,好在问题艰深,不懂也正常,所以俺还有自卑。

不太好的情形是,无论是虚拟的“低俗小说”还是现实的道德画面,每次路遇其中之一,都会互相纠缠到一起,结果是思绪容易呈麻花状。

看到那些义愤指责不道德行为的文字,听到严词宣判无良风气的话语,通常我都会责问自己:何以俺不是“高尚的人”——虽然不知道何为“高尚的人”,但还是相信那些“愤怒天使”是高尚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如遭遇此类事件,我基本想不起关于他者道德的评价,所为至多是出手尽力而已,偶尔不得不阻止的时候也是相伴行动的规划,而不是通过指责“冷漠的大多数人”来彰显自己的境界。

以我卑鄙的处事习性,在一个充斥寒凉驱壳的集合体中,与其消耗热量在沉寂或喧嚣的集市胡乱嚷嚷,还不如保持自己的体温,让寒冷的邻居感觉、意识到温暖人体的存在——大家都是可以有温度的。

关于这样的意识自觉,自己有切实体会。

不知是从电视里,还是某些特别的话语片段中,儿子打不识字就学会了关于红绿灯的哲学思想,拒斥中国式过马路。这在20年前有点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我很不开心,但又不忍心用大棒来训导儿子。很多次,我都会在红灯下穿越斑马线后,转身看着小尺寸的儿子在马路对面等绿灯。这感受不是太好,可你怎么给他讲现实、有用,甚至是伟大的道理都于事无补,小脑袋根本听不进去。而对我的言行,他从不表态,只是一直这么固执着。

数年后的高中,思想品德理论老道的老师问学童,可有谁没有例外地始终坚持规则么?课堂上数十位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一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儿子。老师不信,然后,那些小学、初中就和他一起在马路上与车龙为伍的学童都挺身证明之,老师还是不信,但我信。

此后,俺再也没闯过红灯,进而看到“中国式”传统时,还有良言,这个可以不继承。但我还是不会“高尚”地指责那些“像牛一样听不进琴音”的人——自己也曾经是“牛”嘛。

实际上,自己没高尚和牛没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指责大多数。说到“大多数”,这是个人判断,没有统计学意义。我通常会这样认为,当人们对那些救助危难同类——比如毫不费力帮助盲人过马路,或者贼人凶顽英雄挺身之类——不吝惜赞誉的时候,其所谕示的是稀罕“物件儿”,另外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良民”才是大多数。

情形何以如此呢?坦白说我一般不去想,我仅仅是想,倘若“大多数”这样的群体真实存在,就不应该让他们“独自”承受道义的责难;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反过来,倒是那些义愤的发声者会勾起我的遐思:如果这些人在场,是不是社会风气就大大改观了呢?有点奇怪,无际虚拟世界装不下、满世界漫溢的心灵侠客们总是不轻易出现在现实社会里,内中缘由虽难说,但我还是能够理解。

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本来就是有区别的,即便没有行动,“大多数”未必不是心怀理想的族群,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至于现实演绎的场景和故事,定然有其充分的根由,至于是什么,我以为得让那些高瞻远瞩的大人物来定夺。

知善(即便真的知道)和行善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德本质上不是说教的,但你仍然可以说,问题是在高调的道德言说和现实的行为之间,需要一座通衢的桥梁,有吗?

怀 念

梁秋红

微凉的风
细碎的雨
旧年的泪滴

逝去的时光
流淌着别样的艰辛
回忆时只有一声叹息

在那走过的路上
曾经的记忆早已泛黄
路上飘散着过去

加锁的时间
无法再重复
只有接受分离

欧 阳

这些年关涉道德的具体影像,总是会激荡出高远的声响,一些高尚的道义人士甚而还会亲自动手画一条线,并以“道德底线”来强调其所画之线的重大意义,诸如此类。

作为市井之徒,俺眼界比较低俗,当然,也有自我拔高的时候,可就算如此,“道德”这种复杂高深的学问,还是不敢自认为清楚明了。

比如说吧,无脑喜欢昆汀·塔伦蒂诺的电影《低俗小说》,虽然电影看了很多遍,末了我还是搞不清楚,那个叫朱尔斯的黑道小混混为什么会决定放弃娴熟的职业生涯,这还不够,这货居然还准备苦行僧般去追求真理……

这变化太大了,很烧脑。照镜子看看,简单如“纯粹的人”到底所指是什么我都搞不清楚,复杂如斯的思想怎么能够明白啊!可能是路口走岔了,想了不该想的事儿,好在问题艰深,不懂也正常,所以俺还有自卑。

不太好的情形是,无论是虚拟的“低俗小说”还是现实的道德画面,每次路遇其中之一,都会互相纠缠到一起,结果是思绪容易呈麻花状。

看到那些义愤指责不道德行为的文字,听到严词宣判无良风气的话语,通常我都会责问自己:何以俺不是“高尚的人”——虽然不知道何为“高尚的人”,但还是相信那些“愤怒天使”是高尚的。原因很简单,在我的生活经历中,如遭遇此类事件,我基本想不起关于他者道德的评价,所为至多是出手尽力而已,偶尔不得不阻止的时候也是相伴行动的规划,而不是通过指责“冷漠的大多数人”来彰显自己的境界。

以我卑鄙的处事习性,在一个充斥寒凉驱壳的集合体中,与其消耗热量在沉寂或喧嚣的集市胡乱嚷嚷,还不如保持自己的体温,让寒冷的邻居感觉、意识到温暖人体的存在——大家都是可以有温度的。

关于这样的意识自觉,自己有切实体会。

不知是从电视里,还是某些特别的话语片段中,儿子打不识字就学会了关于红绿灯的哲学思想,拒斥中国式过马路。这在20年前有点不愿意做中国人的意思,中国人我很不开心,但又不忍心用大棒来训导儿子。很多次,我都会在红灯下穿越斑马线后,转身看着小尺寸的儿子在马路对面等绿灯。这感受不是太好,可你怎么给他讲现实、有用,甚至是伟大的道理都于事无补,小脑袋根本听不进去。而对我的言行,他从不表态,只是一直这么固执着。

数年后的高中,思想品德理论老道的老师问学童,可有谁没有例外地始终坚持规则么?课堂上数十位自幼接受良好教育的孩子中只有一位给出了答案,那就是我儿子。老师不信,然后,那些小学、初中就和他一起在马路上与车龙为伍的学童都挺身证明之,老师还是不信,但我信。

此后,俺再也没闯过红灯,进而看到“中国式”传统时,还有良言,这个可以不继承。但我还是不会“高尚”地指责那些“像牛一样听不进琴音”的人——自己也曾经是“牛”嘛。

实际上,自己没高尚和牛没关系,更主要的原因是我不知道有什么理由指责大多数。说到“大多数”,这是个人判断,没有统计学意义。我通常会这样认为,当人们对那些救助危难同类——比如毫不费力帮助盲人过马路,或者贼人凶顽英雄挺身之类——不吝惜赞誉的时候,其所谕示的是稀罕“物件儿”,另外的一面,也就是那些无动于衷的“良民”才是大多数。

情形何以如此呢?坦白说我一般不去想,我仅仅是想,倘若“大多数”这样的群体真实存在,就不应该让他们“独自”承受道义的责难;责任是每个人都有的。

反过来,倒是那些义愤的发声者会勾起我的遐思:如果这些人在场,是不是社会风气就大大改观了呢?有点奇怪,无际虚拟世界装不下、满世界漫溢的心灵侠客们总是不轻易出现在现实社会里,内中缘由虽难说,但我还是能够理解。

现实世界是什么样和应该是什么样本来就是有区别的,即便没有行动,“大多数”未必不是心怀理想的族群,为什么要指责他们呢?至于现实演绎的场景和故事,定然有其充分的根由,至于是什么,我以为得让那些高瞻远瞩的大人物来定夺。

知善(即便真的知道)和行善完全不是一回事,道德本质上不是说教的,但你仍然可以说,问题是在高调的道德言说和现实的行为之间,需要一座通衢的桥梁,有吗?

职场故事

关振学

屈指算来,我进矿当工人已整整38年了,时光荏苒,一切都恍如昨天,那些曾感动我的故事,就如同电影里的镜头,时常会在我的脑海闪现,定格成难忘的画面。

刚学徒时,一次到单位机关食堂处理电气故障,忙完工作已经是中午,几位师傅就在食堂用餐,每人交了二两粮票和两角钱,不知谁说了一句:小关是徒工就免了吧,那次我享受了一顿免费的午餐,虽然至今不知道是谁为我垫付的,但从那时起我就爱上了这个温暖的集体。头发长了,杨哥就主动给我理

发,自行车骑坏了,于师傅就放弃午间休息给我修好,家里偶遇困难,我就从班组互助会借钱救急。

生活上的点滴帮助,工作中的悉心照顾,班组成为我可以依附的靠山和安全的港湾。一次跟师傅到山下变电站进行清扫作业,我习惯地拉下闸刀,就要去盘后清扫,只听师傅大喝一声:验电了么?我说闸刀已经停了,师傅说:那也不行,如果有开关因损坏而处于接通状态,后果不堪设想啊!师傅狠狠地训斥我之后,又语重心长地说:干咱们这行千万不要有一丁点麻痹思想,我要对你和你的父母负责啊!一番话听得我低下了头,从此不敢有丝毫大意。

那时,我们都是骑着自行车奔波于矿山各个维修站。一年盛夏,天气异常闷热,我跟石师傅到3

工厂是品质大课堂

号深井泵站检修,回来骑到一片瓜地时,石师傅从自行车上跳下来,招呼我说:大热的天,来尝尝瓜吧,我请客。坐在树荫下,品尝那香瓜可真甜啊。多少年过去了,石师傅因病去世也已多年,但他慈祥的笑容,我至今还记忆犹新,记吃不记打,别人给我的好,一生都很难忘。

那些年,班组年底评选先进的名单,最后都是由我这个班组工会小组长报到车间。记得有一年,班里有三个先进名额,通过投票评选,我也在其中,在去车间送报表的路上,我把自己的名字勾掉,填上工作肯干但心直口快爱得罪人的王师傅的名字。后来,工会主席半开玩笑地对我说:还是你贼啊,车间还有一个先进名额,就是你了。我心里涌起了一股暖流。

我和郭明义在同一个矿山工作,是非常熟悉的朋友。记得有一年盛夏,我们在山上敷设洒水管线,个个都忙得汗流浃背,只见老郭提着一袋冰果招呼着大家,后来得知这是老郭自掏腰包购买的。双休日下夜班时,我总能看见老郭,还是那身工作服,他嘱咐我下夜班注意休息,然后朝着采场大踏步走去,老郭的奉献精神令人佩服。

岁月沧桑,记忆难忘。工厂,不仅仅是做工和养家糊口的地方,也是锤炼意志品质和感受人生真善美的大课堂。

作者关振学,男,出生于1962年,曾做过装卸工、修路工、电工,现为鞍钢矿业集团设备检修协力中心检修工。

七月·飞雨

张伟东

我将飞雨系成一束花
托春风捎给海边的流霞
去拥抱远处归来的朵朵浪花
把江南的流水融化

雨后的夜晚
没有奇迹可能发生
畅想的火花
在回望的旅途上
点燃了漫延的思绪

少年的心愿
尘封在日记里
在昼夜的嬗变里 不眠
老年的心愿
迷惘了许多往事
经过风雨千番 却安然

梦在清晨衰老
在落雨的窗前 破成心瓣
人在路上 心在路上
世界不会停下了等你
激情永远是工作和生活的动力

用心爱一个人吧
她会使你一生美丽
七月的飞雨
来自星星的你
说些贴心的话吧
用那甜言蜜语
将我融化

司马懿

为何越来越受追捧?

刘兵

当下电视剧《军师联盟》正在热播,吴秀波饰演的司马懿受到观众的喜爱。司马懿作为三国的最终赢家,之前在影视作品中基本上处于配角地位,历史评价也不高,比起诸葛亮、曹操、刘备等人物,知名度也逊一筹。司马懿的形象随着时代变迁而变化,成为主角,预示了当代人与创作者对这个人物的新理解。

在三国这段历史中,司马懿是一位靠隐忍、权谋和机智夺得胜利的最终赢家。虽然如此,司马懿在历史上终究贴上了奸臣的标签。他很善于隐藏和伪装,他在曹魏历事四主三朝,虽然几次外放冷落,几次褫夺兵权,但总能在政治危机中化险为夷,最终登上权力的顶峰,为子孙篡魏奠定坚实的基础。可以说司马懿是三国时期最出色的政客之一。

由此我又想到先前高希希导演的电视剧《三国》。在这部电视剧中,一改原著《三国演义》“扬刘抑曹”的写作手法,以曹操为主角,体现出曹操的雄才伟略,而剧中的诸葛亮少了几分神化色彩,很多场合更接近于常人。反对者认为这是在为曹操这个“汉贼”翻案,与原著不符,而支持者则认为脱离了原先的脸谱化,更接近历史真实的曹操。历史家评价曹操为“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以前作品多体现的是后半句,而对于前半句则刻意抹杀。曹操有战略眼光,迎汉献帝到许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他唯才是举,破了世族门第观念。曹操的性格是敢作敢为,什么事情都拿得起放得下,没有半点畏惧顾虑之心,不怕世人对他的议论,反正我就是我,我就是这样,为了达成自身的政治目标,谁也拦不住我,谁也挡不住我。这种勇往直前的气魄可谓真性情。因此曹操在当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喜欢。

中国传统社会对人物的评价,道德操守是最重要标准。孟子说,“道之所在,虽千人吾往矣”。评价历史人物不以成败论英雄,关羽失荆州,诸葛亮北伐不果,不仅没有掩盖他们的光辉形象,反而使他们的形象在民间不断被神化,这都说明中国传统社会以道义衡量英雄的标准。中国自古以来敬仰的都是忠孝节义的人,而不忠不孝不仁不义的人,即使能力再强,功绩再卓著,也很难受到人们的敬佩。

当前中国社会高速发展,急速转型,人人都想获得成功,都想流动到更高的社会阶层。因而成功学大行其道,在这种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社会氛围下,曹操和司马懿的人气度上升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演义中刘备的仁德,关羽的义气,越发不被人看重,而处事果断,雷厉风行,通过自己的野心及高明的策略获得成功的曹操和司马懿则越发受人追捧。

当然,司马懿等枭雄能够隐忍、有耐性,在逆境中百折不挠是成功的重要品质,但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反思,在追求成功的过程中是否树立了正确的成功观。成功不单单是权力、地位和金钱的获得,判定人生是否成功,应该主要看个人的人生理想和社会价值是否得到实现,是否做出了对社会有价值、有意义的事。这实际上也是传统文化评价英雄标准的升华。

给自己一个大目标

雪如月

洛克菲勒曾自信地说:“我敢打赌,就算把全世界的财富平均分配给每个人,两年后,全球财富的分配比例就会和现在一样,有钱人依旧是有钱,而贫困者依旧贫困。”

洛克菲勒把这种现象归结于人们的目标不同。他认为,人的目标和行动不同,所能创造的财富也将不同,所以,人们获得成功最重要的因素就是目标的抉择。同为有目标的人,有的取得大成功,有的取得小成功。目标有大有小,有近有远,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在确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不脱离

实际的基础上,尽量把目标定高一些、远一些,大目标成就大事业,小目标成就小愿望。

一只老鹰比一只山雀飞得更高更远,但如果你志在千米高空甚至志在月球,那就不必羡慕雄鹰了。人都是有惰性的,而大目标可以帮助我们将惰性尽可能地从思想中清除出去,让潜能充分发挥出来。所谓“思想有多远,我们就能走多远”,这话不假,如果你想要人生更加丰富和精彩,那么你就需要站得更高,看得更远,树立更远的志向。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当我们决定走10公里的路,那么我们可能走到6公里的时候就觉得很累了,可如果我们决定要走20公里,那么走到6公里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才刚刚出发,正精神饱满着呢。这

就是在远目标下所产生的动力效应。高明的弓箭手都知道要想射中靶心,决不能瞄准靶心,而要瞄准靶心偏上的位置,这就是“取法于上,得于其中;取法于中,得于其下”的道理。

拥有高目标的人显得大气而不斤斤计较,而胸无大志的人往往狭隘。高远的目标通常能带来远见,心中有未来的描绘。有远见的人能看清自己的目标,也知道自己要飞多远,能飞多远。

从一定角度上来说,人生的精彩程度与目标的远近呈正比,所谓的精彩人生,其实就是考虑更多的事,在更大的范围内解决更多的问题,最大限度地发挥潜能,在更大的空间和时间里产生更大的影响——哪怕他是个“事业”的失败者。



生活里所受的委屈,消化了就是成长的动力,消化不了就会变成脾气。赵春青画

以书下酒,以云赠人

张燕峰

爸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学生,骨子里有点也许是那个时代文人洒脱浪漫的气质,尽管物质匮乏,但仍能在贫瘠之中把每一个日子都过得活色生香。

爸嗜书。用他自己的话来说,那就是“凡我在处,必有书”,“可以一月无肉,不可一日无书”。确实如此,爸无论干什么都手捧着一本书,吃饭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就连上厕所的时候,也要读书。

爸读书特别专注。有一次,妈喊他吃饭,连喊三声,他纹丝不动。妈生气了,冲过去一把夺过书,从窗口扔到院子里。当时外面正下着瓢泼大雨,爸像豹子一样窜到院子里,把书救了出来,又是用毛巾擦泥水,又是不停地用手捋净。做完这些,一向好脾气的爸第一次对妈怒目而视。

爸还嗜酒。那时工资不高,还要按月汇钱给爷爷奶奶,但他坚持嗜酒